

张曙光 著

美国遏制战略与 冷战起源再探

U.S.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 Revisit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教材基金项目

美国遏制战略与 冷战起源再探

U.S.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 Revisit

张曙光 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外教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张曙光著.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5446 - 0410 - 9

I. 美... II. 张... III. 冷战—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IV. D871. 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6777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郑巧娣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 字数 358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100 册

书 号: ISBN978-7-5446-0410-9 / H · 0174

定 价: 24.0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教材基金项目

编委名单

主编 戴炜栋

副主编 吴友富 李基安

编 委 (按拼音顺序)

冯庆华 李 勤 林洵子 陆培勇

皮细庚 史志康 卫茂平 徐宝妹

虞建华 张祖忻 庄智象

总序

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和信息的全球化。在这种发展趋势下,人才、人力资源开发成为推进现代社会进步的基本因素。因此,作为培养人才,推进人才资源开发的高校,在促进人类和平、繁荣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然而,高校要培养一流的人才,促进人力资源的开发关键要有一流的学科、一流的学科队伍。据此,加强高校的学科建设,以学科建设作为高校综合改革的龙头和核心,是深化高校改革,全面发展高校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上海外国语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建校50多年来,学校始终以学科建设、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复合型、国际型的高级专门人才作为办学的根本宗旨。学校认识到:未来的10年、20年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时期。学校要紧紧抓住机遇,强化学科建设,“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变化中发展,在发展中深化,在不断的发展和深化中实现学科建设跨越式发展。以此增强学科的竞争力,提升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声誉,全面适应国家和上海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

推出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科建设系列著作、教材100本,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强化学科建设的有力举措。这项工作始于2001年。学校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完成此项工作。上海外国语大学现有博士点9个,硕士点18个,博士后流动站1个。除了语言文学专业外,还包括了应用性、复合型的专业,如国际

关系、国际贸易、企业管理、教育技术、新闻学、外交学等。100本系列专著与教材基本上涵盖了上外18个硕士点中的主要专业方向的主干课程和研究选题。这样，既提高了上外的学科建设的水平，又规范了上外研究生的教学，为提高研究生的教学质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00本系列专著与教材的编写者基本上都是我校各学科点的学术骨干，同时也有部分外校的专家、学者参加编写。在编写前，项目都经过选题论证、专家评审、专家组无记名投票、校学科领导小组通过等程序。严密的程序，保证了选题的科学性、客观性、全面性和适用性。校学科领导小组对编写工作实施过程管理，即定期、不定期地对编写进度、编写质量进行检查，根据检查的结果给予一定的奖罚。这样，保证了100本系列专著和教材的编写质量。

这100本学术专著和教材适合于（有选择使用）英语语言文学、俄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阿拉伯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比较文学、国际关系、国际贸易、企业管理、教育技术学、新闻学、中国现代文学等专业的研究生教学，选择其中的部分可以直接作为专业方向教学的教材。

学科建设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科建设系列著作、教材100本》错误在所难免。如有疏漏、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希望这100本专著和教材在教学与科研实践中逐步走向成熟。

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教授 吴友富
2003年10月

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

目 录

第一章 冷战、遏制与国家安全战略	1
第一节 界定冷战	3
第二节 解析战略	8
第三节 解读遏制	16
小 结	21
第二章 凯南与遏制战略雏形	23
第一节 “长电”	23
第二节 国家利益观	32
第三节 非等称遏制	41
小 结	49
第三章 杜鲁门与遏制战略实施	51
第一节 以美援预防危机	51
第二节 以“堡垒防御”重建均势	60
第三节 以“楔子外交”分化苏东阵营	71
小 结	81
第四章 遏制战略的转折	83
第一节 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83

第二节 宣布亚洲“环形防御圈”	93
第三节 考虑对苏核威慑	103
小 结	113
第五章 重新界定美国安全利益与苏联威胁	116
第一节 以美国战略目标重审冷战态势	117
第二节 以意识形态描述“苏联威胁”	123
第三节 以能力界定“苏联威胁”	129
小 结	138
第六章 选择全面和无差别遏制	141
第一节 谈判不作为战略选择	141
第二节 在维持现状、回归孤立与实施战争之间	147
第三节 “全面遏制”成为唯一的选择	158
第四节 “全面遏制”的实施要点	166
小 结	173
第七章 全面遏制的资源配置要求	177
第一节 美国实施冷战的政治资源	177
第二节 美国实施冷战的经济资源	183
第三节 美国现实的与潜在的军事能力	192
第四节 核军备的冷战功能	197
小 结	206
第八章 全面遏制战略遭遇“朝鲜战争”	209
第一节 出兵朝鲜与“中立台海”	209
第二节 打过三八线“收复失地”	220
第三节 “回家过圣诞节”	233
小 结	243

第九章 对全面遏制战略的历史评估	248
第一节 从“修正”到“后修正”	248
第二节 “新冷战学者”的评判	259
第三节 全面遏制战略制定者的反思	277
小 结	287
第十章 历史、现实与未来	290
第一节 美国冷战遏制战略的误区	290
第二节 美国冷战对华战略思考与决策	300
第三节 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新冷战	306
小 结	324
附件一 凯南“长电”	329
附件二 国家安全委员会 20 号文件	347
附件三 国家安全委员会 68 号文件	357
冷战国际关系研究英文文献书目与简介	423

第一章

冷战、遏制与国家安全战略*

国际社会刚刚进入 21 世纪，便经历着大国关系的一个重大变化：中美从“冷战[Cold War]”后期的“战略伙伴[Strategic Partner]”，逐渐成为“后冷战”的“战略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就美国而言，中国的崛起，成为对其超级大国地位最为严重的挑战之一。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对“中国威胁”的渲染，使国际社会仿佛又重新回到了 40 年代后期西方对“苏联威胁”的制造。如何对待“中国威胁”，华盛顿的答案似乎不一而足。老布什后期实行“动态遏制[dynamic containment]”，克林顿八年执政极力推行所谓“既接触又遏制[engagement]”政策，小布什上台以来似乎大有回归“动态遏制”的势头。

美国是否企图延续在亚洲似乎早已结束的冷战或是发动新的冷战？更确切地说，美国是否仍将沿用遏制战略对待所谓“中国威胁”？对这两个问题的认识，国内外学者仁者见仁。持否定态度者认为，冷战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的一个特例已经成为历史，美国针对中国的冷战更是不可思议。主要依据是：自“9·11”以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重点是全球性反恐，对外与国防政策的核心是通过“国防转型[Defense transformation]”和“政权变迁[Regime change]”消除来自“四个邪恶轴心国”——伊拉克、伊朗、叙利亚、朝鲜——的威胁，特别是所谓大规模杀伤武器(WMD)的威胁。据此，美国 21 世纪

* 本章部分内容已在《社会科学》2006(10)期第 66—75 页发表，特予说明。

的长期安全战略，充其量是实施一场针对支持“极端伊斯兰主义”的穆斯林国家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全面圣战。冷战结束以来，随着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制度转型”的完成和与西方世界的不断加深的“融合”，随着中国现代化乃至西方化程度的持续和快速提升，随着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全球性扩张的不断推进，任何一个理性的美国领导人和战略家都会认定，华盛顿对正在“和平崛起”的而且一心一意将自己融入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的中国发动一场以遏制为核心的冷战，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不可思议——由于中国市场的巨大吸引力，没有一个美国政府能取得国内和传统盟友对遏制中国政策的支持和响应。更有智者认为，一个受到美国和西方遏制以至力量削弱的中国，并不符合美国的长期利益。^①于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做出的一系列的军事安排，至多只是将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对手”而实施“有限的防御”。^②

然而，对美国是否会对——或已经开始——发动一场以遏制中国“崛起”为核心的新冷战的认知，若能以分析美国冷战期间“遏制战略”的起源为起点，并探讨其遏制战略的形态变化，不仅对研究判断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有着十分重要的政策意义，也对理解当代大国关系中的战略思考与运作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对此分析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最高决策层将遏制所谓来自外部的威胁作为冷战的战略选择，并在政治、外交、国防和军事等层面进行不间断地运作。建立在这种立意基础上的分析至少应涵盖三个层面。第一，冷战状态；第二，战略选择；第三，遏制内涵。在这三个层面上，至今仍存在着一系列具有国际关系理论意义的问题，而中外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方兴未艾。

① David M. Lampton, “Paradigm Lost: The Demise of ‘Weak China’,” *The National Interest*, Fall 2005, pp. 67 – 84.

② Andrew Murray, “Challenge in the East — The U. S. is using the war against terror to establish new bases around China, its emerging rival in Asia”, *The Guardian*, January 30, 2002.

第一 章

界 定 冷 战

到底什么是冷战？冷战状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产生？冷战状态下的国际关系又是怎样发展与调整的？对这些问题，西方学者均通过自身的研究，试图提出直接的或间接的解答。他（她）们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经过数十年的整合，实际上已经推出了一个以冷战国际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多元且交叉的学科，即：冷战国际关系学。尽管外交史、国际政治学者仍占据该学科的主控地位，越来越多的新兴学科——诸如行为学、心理学、传播学、文化学等——学者的参加研究，使得这一领域由较为单一、传统的研究逐渐转向多元化与跨学科。^①特别是由于近期中国、俄罗斯、东欧国家国际关系学者的加入，^②冷战国际关系研究

-
- ① 美国国家级“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威尔逊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为了推动对“冷战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于1995年成立了“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项目”。美国的哈佛大学、俄亥俄大学，以及英国的伦敦大学也分别成立了“冷战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机构。
- ② 参考：Zhai, Qiang, *The Dragon, the Lion, and the Eagle: Chinese-British-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8*. (Kent, OH: 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Shu Guang Zhang,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Chinese-American Confrontation, 1949–1958*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2) and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9–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Westad, Odd Arne,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Sheng, Michael M.,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真正开始“国际化”了。应该说，这门始于 20 世纪中叶的年轻学科充满活力。

然而，如果透视现有的研究结果，不难发现：对于冷战起源的研究，假设仍多于结论，概括仍胜过理论。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四个学派，即：“传统派”、“修正派”、“调和派”或“后修正派”与“国际派”。^①在 50 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所谓“传统”派认为：冷战作为相对于“热战”——如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种“非战非和”的大国关系，是由国际政治结构所决定的。二战的结束，并未产生使国际社会“长治久安”的国际体系。随着传统大国——如英、法、德、日、意——的衰退，作为新兴大国的美国与世界范围内反法西斯战争中担纲主力的苏联当仁不让地成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然而，在“主角”间却存在着“势力范围”的不平衡。在这个“不平衡”的关系中，苏联由于其传统“不安全”意识的主导、“集权”制度的制约、“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导向、领导人“机会主义”倾向的影响等“非理性”因素，在对外政策中推行“霸权”与“扩张”，因而造成对美国与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安全的所谓威胁，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国家利益，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得已以“非战争”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的方式——如 1946—1947 年间对土耳其、希腊的援助，1948 年对欧洲实行的马歇尔计划，乃至建立联邦德国和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等——对抗苏联。因此，冷战是苏联的“非理性”挑战与美国的“理性”应对的结果。^②

① “传统派”的英文为 Traditionalists、“修正派”的英文为 Revisionists、“调和派”的英文为 Reconciliationists、“后修正派”的英文为 Post-revisionists、“国际派”的英文为 Internationalists。

② 关于“传统派”，参看：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46 (1967): 22—52; 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1900 — 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William H. McNeill, *America, Britain and Russia: Thei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1941 — 1946*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这种依据于结构的不平衡导致大国关系的不稳定,以至苏联“挑战国际现状”的观点,很快受到“修正派”的批驳。虽然也承认战后国际秩序的不平衡与不合理,但“修正派”认为美国更应该对冷战的出现负责,主要原因则是华盛顿对外政策“充满了非理性”。根据“修正派”学者的研究,美国政府领导层出于满足国内“垄断寡头”的经济利益需要,利用美国二战后所拥有的特殊的国际政治地位,企图构建“世界经济霸权秩序”,推行“开放式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于是,同样被认为是出于“理性”基础的美国冷战政策与举措——如对土耳其、希腊的援助的杜鲁门主义,援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加强西半球政治稳定的第四点计划和大西洋公约组织等,无一例外被认为是经济驱动的结果。当然,盛行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修正派”,难免受到当时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政治与文化氛围——如反“越战”运动、反文化思潮、“新左派”思想等——的影响与制约。^①其学术视角的片面与研究方法的单一,随着学术界政治热情的不断降温,自然受到了新一代学者的质疑。

质疑者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形成所谓“调和派”或“后修正派”。基于美国首批解密的冷战初期外交、军事和国家安全档案与文献,“调和派”回到“传统派”的一个基准点,再次强调战后国际政治结构“不平衡”是冷战爆发并延续的“病根”,但同时也指出,美苏两国决策者均应对冷战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① 关于“修正派”,参看: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Norton, 1958); Walter LaFeber, *The New Empi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3) and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1980*, 5th ed. (New York: Knopf, 1985); Gabriel Kolko, *The Ro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oston: Beacon Press, 1969), and Gabriel Kolko and Joyce Kolko, *The Limits of Pow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2); Lloyd Gardner, *Architects of Illusion*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70); Gar Alperovitz, *Atomic Diplomac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7); and Richard Barnet, *Roots of War* (New York: Atheneum, 1972)。

任”。如美国将“冷战全球化”的结果，尽管不是受严格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思想所驱动，但带有显著的“帝国构建倾向[Empire-Building or Imperial Inclination]”。此外，不少的学者沿用国际关系研究盛行的一些理论假设和分析框架，从华盛顿战略思考的错位、国内政治对理性决策的制约、官僚机制的惰性和狭隘、决策者的个人局限性，甚至情报的虚假和不确定性等方面，论证了美国政府的冷战战略思考和实施的非理性部分；并试图诠释其产生的原因。^①

以 90 年代初苏联、东欧解体为标志的“冷战结束”，使学术界对冷战国际关系的研究热情又创新高。特别是由于原“共产主义阵营”学者的加盟和来自“对方”的档案文献的有限公开，^②以及多个新兴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影响，使得对冷战的研究日趋多元化与国际化，从而也形成一个所谓“国际派”，或如约翰·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所称“新”冷战学派（“New” Cold War historians）^③，其鲜明的特点是：能够熟练使用“对方国”语言，有幸接触“对方国”刚刚解密的档案和文献，并能够将冷战的经历放在一

① 关于“调和派”，参看：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2);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Wiley, 1978),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The Long Pe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and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Deborah Welch Larson, *Origins of Contain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Gaddis Smith, *Morality, Reason, and Powe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6); Melvyn P. Laffler,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② 为了推动苏联和东欧国家涉及冷战的档案文献的解密，位于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于 90 年代中期成立了“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项目”，并不断地公布最新解密的档案与文献。参考：www.cwihp.si.edu。

③ Gaddis, *We Now Know*, pp. 281–295.

个互动的环境中描述与分析。^①“新”冷战研究至少对“旧”冷战研究的一些假设——诸如盖迪斯所归纳的“权力的多元化对冷战进程的影响要比权力的平衡大”、“尽管实质有异但美国和苏联均试图在战后建构各自的帝国”、“民主制度在维护同盟方面要比专制制度优建”以及“核武器导致破坏性与长久性换位”等^②——提出了部分的佐证和说明。然而，目前的成果仍表现出明显的“重实证、轻理论”以及“重描述、轻分析”的研究倾向。此外，由于苏联、东欧国家甚至中国的档案文献的解密仍处于初级阶段，公布的，并能为学者研究所提供的材料仍不够全面、系统，迄今，学者们所能够接触的资料反映的只是冰山的一角。

显然，各个学派均有各自明显的优劣势，但如果能采纳各派之长，走“理论指导”与“历史实证”相结合的路，冷战的研究领域必定得以拓宽、夯实。本书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在研究方法上做此尝试。在“理论框架”构建上，提出三个基本假设：

第一，冷战是一种以国际安全或冲突解决为主轴，并以权利的平衡为动力的大国国际关系“对冲”的系统；

第二，冷战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自身的思维、逻辑、认知与话语，而正是由于这个意识形态使得冷战不仅持续地主导着 20 世纪下半叶的国际关系，而且渗透于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③

^① 如：Odd Arne Westad, Kathryn Weathersby, David Wolff, Vladislav Zubok, Mark Kramer, Ilya Gaiduk, Christian Ostermann, Chen Jia, Qiang Zai, Shu Guang Zhang 等。中国加入了这一“阵营”的学者有：沈志华、李丹惠、牛军、杨奎松、章百家等。

^② Gaddis, *We Now Know*, pp. 283 – 295.

^③ 参看：John G. Stoessinger, *Crusaders and Pragmatists*, 2nd ed. (New York: Norton, 1985); Kenneth W. Thompson, *Traditions and Values in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Eugene R. Wittkopf, *Faces of Internationalism*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 Shu Guang Zhang, *Mao's Military Romanticism* (Lawrence, KS: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94)。

第三,冷战作为现代国际关系的一个特殊时期,核武器的出现和继之而来的核军备,使得大国权力的运作、安全利益的确定、安全威胁的认知和战略资源的积累发生本质上的变化。

此外,在实证层面上,本书采取依据史料、精读档案、推敲概念相结合的“深度案例解读”方法。

第二章 解 析 战 略

研究现代国际关系——特别是研究 20 世纪的冷战国际关系——的西方学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将研究的视角放在所谓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或称之为“大战略[Grand Strategy]”的层面。他(她)们的一个基本认知是:冷战看似为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经济体系、两种政治制度和两个军事阵营的较量,实际上却是关系到民族国家——特别是大国——国家安全利益的殊死斗争。据此,冷战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毫不夸张地被认作是一场大国间国家安全战略的长期博弈。

那么,什么是国家安全战略?简言之,国家安全战略指:国家权力机构为了国家安全利益(其中包括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国家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与机构的不受外力压迫而改变,以及人民的福祉、文化的传承与繁衍得以保障),^①将可以动员的公共资源(或称战略资源[Strategic assets])在国家对外与国防政

① 这里所指的国家安全利益是狭义上的国家利益。学者研究国际安全问题时,常常将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国家的公共利益相混淆。关于两者的内涵与外延的区别,参看: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年);周建明,《中国国家战略研究》(征求意见稿)(上海社科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2002 年);閔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年)。